

清代区域水资源配置效率的理论空间

——山西水利社会问题研究综述

郜明钰 石 涛

(山西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水资源是制约传统社会农业生产的关键要素,水利关系的延伸逐渐成为探索生产要素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一条重要线索,学界将其称为“水利社会”,并基于此展开了一系列清代地方资源配置秩序与效率的探讨,其中,山西地区受到重点关注。然而,无论是就区域整体进行的宏观研究,还是针对某一个案实施的微观考察,资源配置的模式依然尚未定论,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论断依然笼统,有必要科学构建水资源配置效率理论以进一步扩展研究视野空间。

【关键词】水利社会;清代;山西;水资源配置;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3)01-0084-10

Theoretical Space of Water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in Qing Dynasty: Summary of Research on Water Conservancy Social Problems in Shanxi Province

GAO Ming-yu SHI T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Abstract: Water Resources is the key factor that restrict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the extension of water relationship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clu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factors and economic growth, which is called “hydraulic society” in academic circles. Based on this, a series of researches on the order and efficiency of local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were carried out, in which Shanxi wa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However, whether it is a macro-study on the whole region or a micro-study carried out on a particular case, the mod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s still not determined, and the assertions on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re still general.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cientifically construct the theory of water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to further expand the research horizon.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Society; the Qing dynasty; Shanxi province; water resource allocati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水是人类最早用于生产活动的自然资源之一,美国社会学家魏特夫在其著作《东方专制主义》中曾暗示过中国的文明与国家起源同灌溉密切相关^①。从经济功能来讲,传统社会发展水利事业的目标在于

【收稿日期】2022-07-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收入分配与市场研究(7-19世纪)”(19BJL001)

【作者简介】郜明钰(1995-),女,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

石 涛(1969-),男,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

① [美]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页。

增加农业产量以及运输,特别是为漕运创造便利条件,事关农业生产与国家财政,因此,对经济资源集中配置的需要使得治水自然地成为一项“国家大政”。清廷关于水资源配置行政职能的内涵相当丰富,贯穿开发、利用到分配使用的全过程。特别是清康熙朝以来,地方水务治理权逐渐下放到县一级,以便利灌溉为目标的疏浚河道、维修堤坝等公共事务管理均被纳入清代州县官的职责范围,地方水资源配置及其政策效率也开始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

水资源配置是指在特定流域或区域内,通过工程与非工程措施,实现有限的、不同形式的水资源在各用水主体间的分配。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史学界“眼光向下”趋势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农田水利工程与民众生活、社会关系、权利结构等关系的变迁,形成水利社会史研究新阶段。在此之中,魏特夫的“治水社会”学说、魏丕信和珀杜的“国家-社会”理论、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杜赞奇的“权利文化网络”分析工具、日本学界的“水利共同体论”以及黄宗智的“内卷”模式等均产生过重要影响。而关于地方水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冀朝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中,以水利作为传统社会基本经济区划分标准而进行的,清代山陕、河西走廊、福建、江南、直隶、浙江、关中等地区均已形成以水为中心的乡村社会运行模式^①。

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受区域社会史研究趋势影响,王铭铭、行龙、张俊峰、胡英泽等人提出“水利社会”概念,认为应将水资源作为农业社会的主导性生产要素,并以此为中心延伸出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相应发展出“流域”“泉域”“湖域”“洪灌”等水利社会类型^②,用以解释不同区域、不同水源类型下的资源配置模式与社会发展变迁。同湖广、江西等地因经济用途划分而进行的资源配置不同,明清时期的山西虽然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水力产业^③,但境内仍以农业生产需求为主,衍生出以灌溉功能为核心的水利社会^④。

作为经济概念的“水利社会”,本质上是对区域资源配置模式的重新定义,它突破了行政干预的强制性,被视作一种“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资源配置体系运行结果。这种界定方式更有利于回避行政区划同区域文化边界之间的矛盾,被有关学者称为“阐释地方社会的一个努力”,是一个“具有普遍解释意义的理论框架”^⑤。然而,令人疑惑的是,现有研究对传统社会基层水资源配置的研究共识,似乎很难在一个更宏观的层面被理解。因为,对这种经济资源的配置并未被统治阶层所重视,学者们也注意到这一点,饶明奇在《清代黄河流域水利法制研究》一书中指出,清代中央政府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水资源配置制度,甚至地方政府对资源配置职能的行使也相当有限,立法安排以三藩、河务与漕运为主^⑥。为了解释这一问题,学者们将视野投向社会关系对资源配置结构的塑造上。

一、水利社会下的资源配置秩序

山西地处黄河中段,清时境内河流交错,遍布大小泉、湖等不同类型的水源,但在时空分布上却极不均衡,水资源的配置通常表现出浓厚的地域性连接,“小者关乎数村,大者联于异县”,区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变迁均与资源配置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较之其他地域,是“能够从本土经验事实出发,开展一系列的田野考察和实证研究”^⑦的绝佳研究对象。明清时期以资源配置为核心产生的水案几乎遍布全省各地,境内主要水域,如汾河、文峪河、潇河、滹沱河、桑干河、阳武河等流域均产

① 王大伟:《近三十年来中国水利史研究综述——基于CNKI的文献计量分析》,《浙江档案》2014年第2期。

② 张俊峰:《明清时期介休水案与“泉域社会”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③ 张俊峰:《明清以来山西水力加工业的兴衰》,《中国农史》2005年第4期。

④ 鲁西奇:《“水利社会”的形成——以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围垸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

⑤ 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⑥ 饶明奇:《清代黄河流域水利法制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9年,第94页。

⑦ 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生过不同程度的资源争夺,尤以汾河及其支流最为集中,其沿线诸如太原、榆次、太谷、祁县、平遥、文水、交城、介休、灵石、霍州、洪洞、临汾、襄汾、新绛、河津等地均有明清水案爆发的记录^①。

尽管各地水利社会类型与资源配置秩序各不相同,但稀缺性是资源配置的前提这一结论是毋庸置疑的。水资源的丰歉认定通常存在两种维度,相应地,资源配置的模式也存在两种类型。一是资源相对匮乏地区,因人地关系紧张导致的绝对稀缺。行龙、张俊峰等都曾集中关注过汾河流域丰水区农业社会的发展,认为唐宋时期水资源供求尚能匹配,明中叶以来随人口增长、水生态恶化、明初军屯以及外来人口迁徙逐渐转为供不应求,即便是资源相对丰富的晋水流域在宋以后也逐渐由资源共享型社会转向资源竞争型^②,晋水流域流传下来的“峪水为灾”就是“人口增长——资源紧张——无度开发——环境恶化——灾害频发”过程的鲜活案例^③。张俊峰将其称为“有灌而治”的社会类型,并且着重强调了其中“泉域社会”的特殊性^④。

对其他地域或水域资源绝对稀缺性的探讨也基本遵循上述范式,在此之中,胡英泽另辟蹊径,探讨晋南地区围绕“井深汲艰”形成独特吃水制度,并照此处理其他公共事务的现象^⑤。这一点与董晓萍、蓝克利等人在《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中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四社五村这样“视水如命”的严重缺水地区,人畜生活饮水都难以满足,更遑论农业水利灌溉,以节水为主导观念,在当地延展出“不灌而治”的社会类型^⑥。

二是水资源相对丰富地区,因分配使用制度不合理造成的水资源相对稀缺,包括两种情况,分别与奥斯特罗姆所说解决公共事务问题的途径,即政府与市场有关。第一,经济用途配置结构失衡,即资源作为公共物品进行分配时的初始授权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学者对水利社会研究的参与度提升,这种观点开始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清代山西水资源开发利用主要包括农业灌溉、水产养殖与水生植物种植、手工业生产、医学疗养、旅游开发五种,一般以水利灌溉为主,其他产业形成有效补充。不存在市场交易的前提下,产权制度必须建立在社会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区域内资源配置秩序实质上是地方社会权利结构体系的外射,是一种社会性,而非契约性的产权安排。因此,具备经济、文化、社会、政治、象征等多重属性,从而产生不同的表达形式和实践逻辑^⑦。分水主体间关系可以被简化为左右岸或上下游,前者通常采用比例分配制,以“三七分水”最为典型,晋水、介休源神庙和洪洞霍泉均承此制^⑧。后者则依据灌溉秩序进行分配。张俊峰对翼城县“滦池”的研究表明,在其所灌溉的12个村庄内,水权的分配秩序大相径庭,上、中、下游分别呈现出“自在使水”、比例用水、失水三个层次^⑨。然而,因为直接史实佐证的缺失,这种观点始终无法给予相对普遍的解释力。

第二,使用主体配置结构失衡,即水权向某些使用主体的集中。同土地资源相类似,依据获取手段的特点,水资源转让也有“霸水”和“买卖”之分。受山西、新疆、江浙、福建等地一系列“水契”陆续被发掘的影响,资源配置中的市场手段也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霸水行为源于某种特权的行使,诸如地方

① 行龙:《近代山西社会研究 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5页。

② 张俊峰:《明清以来晋水流域之水案与乡村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③ 行龙:《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环境与灾害——以“峪水为灾”为中心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史林》2006年第2期。

④ 张俊峰:《泉域社会:对明清山西环境史的一种解读》,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93页。

⑤ 胡英泽:《水井碑刻里的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⑥ 董晓萍、[法]蓝克利:《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中华书局,2003年,第316页。

⑦ 张小军:《复合产权: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⑧ 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⑨ 张俊峰:《前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水权的表达与实践——山西“滦池”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豪强的经济特权、上游对下游的优先灌溉权、文化信仰赋予的神圣权等。政治特权的行使过程相对简单有效。胡英泽对此进行过专门的考察,称明代宗藩在山西境内的大量占田,是通过王庄来获取水利特权的^①。与之相比,其他两项过程则更加波折含蓄。张俊峰在解读介休《中河碑记》与《源泉平讼记》的过程中,就发现有洪山村和石屯村对下游资源的刻意垄断与强占,张良村则因对源神祭祀不周而被剥夺用水权利,在文中同样有所记载^②。他在对其他水域的研究中也曾表达过近似观点,例如,文水县内的甘泉渠借购买文峪河渠基之功长期独占水权,其邻县广兴镇则需付出大量成本才能获得使用权利^③。而对宗族文化势力的借用须更为谨慎,晋祠的花塔村张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张氏将汾神台验写入族谱,依靠神裔身份带来的象征资本在争水、管水活动中占据竞争优势^④。曾与交城曲里村胡氏、河津干涧史氏等家族利用经济优势,在促进了当地水利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构成资源均衡配置的阻碍^⑤。

清代山西水权转让经历了“以水随地”到“水地分离”的变迁。清廷对水资源最初的定位是土地资源的附属资源,是赋税科则划分标准之一。郝平在对清代山西地契的研究中称,附加水资源的耕地称水地,价格远高于其他类型土地^⑥,水权集中的方向与土地保持一致。清中后期,水权开始作为独立商品进行的买卖,逐渐与地权配置结构相偏离,“有水无地”“有地无水”成为普遍现象。光绪年间,甚至出现以村、镇为单位进行的集体性水权买卖活动^⑦。

二、资源配置模式与执行效率

水资源的配置效率指有限资源在各用水主体间的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理论上讲,水利社会中的资源配置秩序一旦确立,各用水主体按照既定原则执行,水事纠纷的发生概率近乎为零。因此,政府进行政策设计的首要目标即是执行效率的最大化,对水案的处理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考察切入点。正如行龙所说:“以水案为中心,对区域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社会组织结构及其运作、制度环境及其功能等问题开展系统研究。”^⑧但实践证明,尽管部分作为决策仲裁者的地方政府已经尽其所能根据本地资源禀赋的实际情况对这一公共资源进行相对合理的配置,水利社会内县域、村落、宗族甚至个体在秩序商定与执行过程中的冲突依然相当鲜明。正如诺思所认为的,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不同主体之间凭借在长期交往中形成并得到认可的社会关系与认知能力,形成以家庭、家族、村落为单位,以地缘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寻求地方性合作或者进行暴力对抗的行为,不仅关系彼此之间达成共同决策的难度,而且会对执行效率造成影响。

(一)资源绝对稀缺下的配置无效率

学界普遍认为,技术治水在宋代后已经基本失效。水资源绝对稀缺时,任何意义上的配置都难以实

① 胡英泽:《晋藩与晋水:明代山西宗藩与地方水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2期。

② 张俊峰:《介休水案与地方社会——对泉域社会的一项类型学分析》,《史林》2005年第3期。

③ 张俊峰:《水权与地方社会——以明清以来山西省文水县甘泉渠水案为例》,《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④ 张俊峰:《神明与祖先:台验信仰与明清以来汾河流域的宗族建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⑤ 张瑜:《清以来山西水利社会中的宗族势力——基于汾河流域若干典型案例的调查与分析》,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36-37页。

⑥ 郝平:《晚清民国晋中地区社会经济生活初探——基于晋中地区契约文书的考察》,《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⑦ 张俊峰:《泉域社会:对明清山西环境史的一种解读》,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09页。

⑧ 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现供给与需求的适配,只能通过削弱需求以匹配供给。基于此,水案势必具备普遍性与长期性,从而抑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介休洪山泉断流后,水即成为当地发展的瓶颈^①。晋北地区依靠开凿水池积蓄自然降水解决生活用水困难,修理成本高且积水量不固定^②,只能作为补充水源使用^③。而四社五村因长期奉行不灌溉的传统,水资源主要围绕日常生活中的吃水和用水进行配置,人口数量少,村庄规模小,具有强封闭性,社会经济发展也长期稳定在极低水平^④。

一个特殊的例子是,洪水开发作为干旱、半干旱丘陵山区应对较差自然条件的手段,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情况有所缓解。但李辅斌、王长命、张俊峰、周亚等学者同时也指出“猛水灌田”不易控制^⑤,引灌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平遥官沟河流域形成的“一水一麦”耕作方式导致结构性贫困长期存在^⑥,洪洞县河西的“畏旱之区”仅能维持周围32村庄民众的基本生计^⑦,龙祠边山地引洪灌溉的地域受益地亩也极其有限^⑧。

(二)保守式治理的低效率

资源禀赋的变化导致了明清以来向技术治水与制度治水相结合的配置方式转变。以水利为核心,官方就使用规则(水量分配、灌溉秩序、灌溉时间)、组织管理(职官、制度、体系)以及修缮维护(摊派方式、筹款形式、收费标准)等进行了相对详细的制度设计。例如,晋水的灌溉制度就包括渠长甲制与轮程分水制度^⑨,介休源神庙的“水利条规碑”、襄陵县的“平河修水利碑”中的规定也相当细密具体^⑩,对水权纠纷有一定预防、遏制作用。此外,一些民间水规经官府认可后,也能作为流域内的通行准则。

然而,自水利社会产生以来,维护旧秩序和重建新秩序的斗争就始终存在。由于申请官方审判的流程繁琐、成本较高且存在政治风险,民间调解是处理水事纠纷的首选,只有必要时才会寻求官方权威评判。面对一系列参与主体众多、利益关系重大、案情相对复杂的“麻烦案例”,政府被迫予以回应。石泰峰曾对此类现象做出过精妙总结:“正是麻烦案例创立、破坏、曲解或直截了当地建立一个规则、一个制度、一个权威。”^⑪但是,关于水资源配置的正式法律资源有限,不但没有形成专门化、系统化的水利法典,而且地方水利职官的权力有限,且多属兼衔性质,作为主审机构的州县衙只能依据实际情况,基于地方水权习惯法做出法理与人情相权的裁决。李麒在《观念、制度与技术:从水案透视清代地方司法》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准确还原:“主体的多元性、利益的重大性、成因的复杂性,使得司法官员在处理水案时不得不辗转反侧、小心从事。”^⑫即便是附属刑案的事件,民事部分的地位也不高,并且更加注重非实体执行一侧,其结果也往往会受到官员自身能力、制度和时代的局限^⑬。

① 李陶红:《水资源与地方社会——以山西介休洪山村的兴衰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② 胡英泽:《凿池而饮: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民生用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期。

③ 梁四宝、韩芸:《凿井以灌:明清山西农田水利的新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④ 董晓萍、[法]蓝克利:《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第186页。

⑤ 李辅斌:《清代山西水利事业述论》,《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6期。

⑥ 王长命:《明清以来平遥官沟河水利开发与水利纷争》,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39页。

⑦ 张俊峰:《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社会变迁——基于田野调查的分析与研究》,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44页。

⑧ 周亚:《明清以来晋南山麓平原地带的水利与社会——基于龙祠周边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3期。

⑨ 张亚辉:《灌溉制度与礼治精神——晋水灌溉制度的历史人类学考察》,《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⑩ 段友文:《平水神祠碑刻及其水利习俗考述》,《民俗研究》2001年第1期。

⑪ 石泰峰:《跨越文明的误区——现代西方法律人类学》,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⑫ 李麒:《观念、制度与技术:从水案透视清代地方司法——以山西河东水利碑刻为中心的讨论》,《政法论坛》2011年第5期。

⑬ 张艳丽:《试论清代晋南地区黄河滩地的争夺事件——以永济县为中心兼论州县官的行政职能》,《运城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另一方面,新旧制度更替也意味着政治风险和治理成本的上升,张俊峰对汾河流域考察后指出,山西的地方官在进行用水制度改革时普遍偏向于采取“率由旧章”的策略化解水事纠纷^①,如对破坏现有规则的行为进行惩处或对原有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技术性改造,而不是重新确立资源配置秩序。黎城龙王社庙的“诉讼碑”就是存在官方意志的强制性约束决断的体现^②。这种做法虽然与传统社会国家管理和财政税收体系的特点不无关联,实质上却是政策绩与效的取舍,以较低效率保持社会稳定与赋税征纳间长期均衡的同时,通过路径依赖进一步增加制度变迁的难度,尽管并不是“软弱无力”的^③,但新秩序的建立只能诉诸暴力手段^④。

(三)非正式制度约束的高效率

水利社会以“水文化”作为建立和维护资源配置秩序的内在力量,通过传说、信仰、道德、风俗文化、祭祀、勒石成碑等象征符号或形式,表达社群成员对集体资源配置权威性和资源配置秩序合理性的认定。传统社会共同认知源于对天人关系的探索与揣度,天人合一观下的政权尤其擅长将自然现象神格化、崇高化,并以神灵创造作为权威性与合法性的隐喻象征,袁钰在《历史时期洪洞水神信仰问题初探》中将其称之为“以‘人一神一人’的特有对话作为高效配置的有力手段。”^⑤

清代山西境内与水利相关的信仰、牌位、庙宇遍布于山西各地乡野,呈现“无庙不成村”的特点^⑥。各地关于“水神”形象的塑造相当多元,目前所见大致可分为自然水神与人格水神两种,既包括政府通过官方途径赐封的神灵、先贤,如源神、龙神、大禹等,也包括民间村社自创的地方神或争水英雄,如孚惠圣母、洪山五人墓、台骀等。汾河流域几乎每处水源都有主神祭祀,定期举行祭祀活动。早期祈雨祭祀游行等活动的路线、场合与参与者基本形成定式,构成区域性的礼仪标识,某种程度上具有确立地域文化边界、强化地域文化认同的功能^⑦。在水神祭祀中,官方与民间不是两级对立的,双方形成了长期的互补与认同。太原晋水流域的晋祠内,代表官方意志的圣母邑姜和代表民间意志的水母娘娘被共置于一个空间,前者以维系、协调、整合区域关系为宗旨,强调德政的作用^⑧,后者则更多为水权争夺合理性的凭据^⑨。水资源较不丰富的地区虽然没有形成类似的文化特征,但也存在着大量与水有关的民间信仰与风俗。

赵世瑜曾基于官民间的权力关系提出过“一种多元的传统”^⑩的构想,即地方水利组织的结构和体系既非某种意识设计下的制度,也不是社会关系的自然表达,而是特定价值关系协调后的一种平稳秩序。这正是地方社会不同权力组织和用水主体长期资源配置博弈的均衡结果,使得灌溉系统作为地缘因素突出的水利实体具备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英国学者沈爱娣早在2003年就在其所著《道德、权力与晋水水利系统》一文中着重论述了非正式制度结构对清代山西水利组织的影响,称官方正统和民间

① 张俊峰:《率由旧章:前近代汾河流域若干泉域水权争端中的行事原则》,《史林》2008年第2期。

② 张玮:《明清以来太行山地区水文化与乡村社会——以黎城龙王社庙为中心的考察》,《地域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

③ 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④ 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⑤ 袁钰:《历史时期洪洞水神信仰问题初探》,《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⑥ 郭永平:《神庙、族群与区域社会:“黄土文明·介休范例”研究发凡》,《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⑦ 段友文、王旭:《汾河之神台骀传说信仰的文化遗产与村落记忆》,《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6期。

⑧ 石国伟、郭晓霞:《礼俗互动视角下祈雨祭研究——以广胜寺镇水神祭祀为例》,《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⑨ 卢晓娜、郭岩、李永福:《明清晋水流域水母信仰及水母祭祀圈思考》,《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⑩ 赵世瑜:《多元的标识,层累的结构——以太原晋祠及周边地区的寺庙为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非正统价值体系并行不悖,邓小南认为“这里既包括上下尊卑不容含混的统治秩序,也包括家族内部的生活秩序、乡村邻里的共存秩序、社会生产的运行秩序,等等。”^①

以血缘为核心进行的资源配置以家庭和宗族为基点。农户是水资源的最终使用者,也是决定资源配置秩序执行效率的关键。石峰曾在《关中“水利社区”与北方乡村的社会组织》一文给出水利社会对“宗族”的界定:是以“血统”与“继嗣”为组织原则自然形成的社群,是在家族宗教机关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集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功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②。宗族的祠堂祭祀以其在区域社会的社交活动中的权威性,充当了国家与社会互构关系的基本单元,在家庭区域关系横向整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持续存在于明清山西的水利社会之中^③。榆次郭氏、北大寺村武氏都曾借助宗族力量将公共灌溉水源变为“宗族之河”。此外,明代宗藩对水利社会也有一定的长期影响^④。

以地方或职业为纽带形成的资源配置秩序在功能形式上与宗族极其相似,基于村落和渠系发挥社会组织的中介功能。太原、洪洞、介休等地无论是基层管理人员的选任,还是日常事务的处理,抑或是“水利渠册”“水利图碑”等文献档案的编制,官府都不直接参与,全靠地域性的民间组织自行解决。因而,所制定出的资源配置法则需要与区域内社会习惯和各民间主体的利益取向保持一致。部分水册中的受水农户是“水权分割中利益的直接相关者”,将其名为“利户”^⑤。民间水规通常以水权制度为核心,一方面凭借道德约束对用水主体的农田灌溉和生活用水形成有效的软性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也是不同社群权利的保证。特别是以士族为代表的地方精英,与国家官僚体系和基层社会运行都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往往借由“渠长”或“纠首”等身份对这种“民间法”进行合理干预。明清时期晋汾河流域一度实行过农田水源地的选择需要渠长勘察后,经官府核准方可使用的规定^⑥。在晋南龙祠,地方精英是水权格局的决定者,村庄据此结成了特殊利益集团^⑦。例如,介休的东河在长期与上游的洪山河争夺资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东湖龙村为首的水利共同体^⑧;鼓堆水域的重点转向民间灌溉后,形成“私约甚于官法”的突出特点^⑨;洪山泉流域渠甲因不满官方用水规则而屡兴诉讼,最终促成水利制度变迁^⑩。

清政府在很长时间内致力于将基层社会管理纳入中央集权体制的建设,地方水务多为官督民办,李三谋称其“是建立在乡规民约基础上的一项互利、协作的经济活动,实质上乃属乡村人民的自治范畴。”^⑪州县衙作为最高决策机关,通过水权授予和水利秩序整顿,即对水利自治组织机构进行认定与规范,介入公共资源治理。管理机构由区域内全体用水户选举产生。渠长是具备行政职能的最低一级管理人员,负责统筹、监督、协调等工作,是辖区内水权代表者与配置执行者。行龙曾对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进行个案研究后,得出“其在祭祀等公共活动中的作用是宗族和村落无可替代的”的观点^⑫。渠长以下设副渠长、渠司、沟首、渠头、巡水、甲头等职,分别执掌夫役、水利兴修、闸口启闭、灌溉监督等项目,因地域而有所差异。胡英泽认为,水井治理中“纠首”“首事人”“承首人”“总理”等职位的设置也体现了

① 邓小南:《追求用水秩序的努力——从前近代洪洞的水资源管理看“民间”与“官方”》,《暨南史学》2004年第3期。

② 石峰:《关中“水利社区”与北方乡村的社会组织》,《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③ 张俊峰、武丽伟:《明以来山西水利社会中的宗族——以晋水流域北大寺武氏宗族为中心》,《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

④ 胡英泽:《晋藩与晋水:明代山西宗藩与地方水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2期。

⑤ 韩茂莉:《近代山陕地区基层水利管理体系探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⑥ 秦泗阳、吴颂华、常云昆:《明清时期晋汾河流域用水户参与式管理制度研究》,《水利经济》2006年第1期。

⑦ 周亚:《明清以来晋南龙祠泉域的水权变革》,《史学月刊》2016年第9期。

⑧ 张俊峰:《介休水案与地方社会——对泉域社会的一项类型学分析》,《史林》2005年第3期。

⑨ 张俊峰:《金元以来山陕水利图碑与历史水权问题》,《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⑩ 张俊峰:《明清时期介休水案与“泉域社会”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⑪ 李三谋、李震:《清朝洪洞县的河渠灌溉与管理》,《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⑫ 行龙:《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个案研究》,《史林》2005年第4期。

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①。官府、宗族、地方精英三者力量强弱因时因势,彼此交织,共同维护着水利社会秩序的运作。故而邓小南在《追求用水秩序的努力》一文中谨慎地说道:“从我们观察到的案例来看,‘民间’与‘官方’二元对举的分析框架,至少不完全适合于讨论传统地方社会。”^②

这种互动在水利信仰和水利工程的建设维护工作组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大型水利工程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出资兴办,县域内水利设施则有赖多元主体共建,又透过不同地域社群生活的现实诉求得以强化。临汾水利日常运行依靠民间自我管理,诉讼爆发时才会由政府出面解决;晋南通利渠的组织机构与运行制度自治性质浓厚,但也有对官方内容的体现^③;介休源神庙的祭祀活动在北宋时已经初具规模,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均参与其中,修庙与治水构成当地水利社会发展的两条主线,现存相关碑文达32通之多^④。

三、资源配置理论的逻辑空间

对清代山西水利社会的丰富研究充分表明,基层水资源的配置呈现出不可复制的特点,地域性特点与水资源配置秩序不必然相关,水资源配置秩序与政策效率也不必然相关。行龙、张俊峰等曾集中关注过汾河中下游及少数支流具有灌溉能力,1602—1935年间汾河曾有过7次断流,地下水与山涧流水随气候变化,并不固定。一旦遭遇连年大旱,水资源的供给便会迅速减少,甚至出现断流,引发水量供给不足和需水量加大之间的矛盾。周亚对龙祠的研究也展示出两个区域会因对洪流资源的认知不同产生防治与引灌两种截然不同的使用方式和利益导向^⑤。而四社五村这样水源极度稀少的地区也能形成高效发达的水利系统和独特的合作式用水方式和水利习俗。

然而,尽管取材、内容、研究方法各有不同,各位学者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方式却基本趋同。不论是从水资源时空分布特征和生产生活情况出发对区域供求关系的考察,还是基于社会关系网络延伸出的制度、组织和治理理论,对争水缘由的探讨均遵循以资源丰歉定争斗缓急,据社会结构判政策效率的制式,或好或坏,笼统论之,形成案例叙事尽详尽细,治理模式极简极略的两极差异。张俊峰曾在对“泉域社会”的研究中指出,水权的可分性是北方干旱区水利社会的特点^⑥,但也仅止步于民众水权意识强烈会降低官府的政策效率,而水神信仰则有一定积极意义。赵世瑜认为晋中、晋南地区流传的各种“分水传说”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公共产权博弈的均衡结果,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效率良好制度的确立需要付出较大代价,如“油锅捞钱”等^⑦。即便是“水利社会”概念的提出者行龙教授,也尚未能就这一议题给出明确结论。

这种特点一部分源于古代资源配置理论的有限性和复杂性,难以形成学界普遍认可的研究范式,但究其根本则是学者们关于水利社会所达成的共识,即社会关系网络在清代区域社会整合中占据绝对主导。但对于山西这样一个商业金融大省来说,自然环境变化是否真的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制约,水利的价值和作用又有无行龙、张俊峰等人所说,是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⑧的课题。特别是在介休这样的“膏腴之地”,自康熙朝王埴变法之后,在较长时间内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执行效率,直至清末并无较大争

① 胡英泽:《水井碑刻里的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② 邓小南:《追求用水秩序的努力——从前近代洪洞的水资源管理看“民间”与“官方”》,《暨南史学》2004年第3期。

③ 周亚、张俊峰:《清末晋南乡村社会的水利管理与运行——以通利渠为例》,《中国农史》2005年第3期。

④ 张俊峰:《介休水案与地方社会——对泉域社会的一项类型学分析》,《史林》2005年第3期。

⑤ 周亚:《明清以来晋南山麓平原地带的水利与社会——基于龙祠周边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3期。

⑥ 张俊峰:《超越村庄:“泉域社会”在中国研究中的意义》,《学术研究》2013年第7期。

⑦ 张俊峰:《油锅捞钱与三七分水:明清时期汾河流域的水冲突与水文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

⑧ 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议,这种配置真的公平吗?是否意味着找到了一项可以被长期执行的高效政策?分水技术、水利组织管理制度、土地占有方式、村社宗族等因素究竟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都有待进一步求证。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水利社会实质上是基于水资源配置秩序建构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发生、发展以及交往的长期过程,滕尼斯将其分为血缘共同体(宗族)、地缘共同体(村社)和精神共同体(文化)三种形式,是由低级向高级的动态发展过程^①。从这一角度出发,资源配置源于共同体成员间或共同体之间欲望无限与经济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新的分配秩序产生必然孕育出新的社会共同体,分配的正义与否“完全取决于生产(过程)的结构”^②,其效率通过一定技术条件下资源在各主体间分配所产生的效益显示。因此,程序正义的判定是解决纠纷或冲突的必要环节。

基于此,进行的科学考量应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与公平。效率包含决策效率、执行效率与技术效率,决策效率是为协调利益各方所使用的时间,执行效率是做出决策后利益各方的接受程度,技术效率是决策所采用的方法是否科学,是否能真正实现公平。一是科学方法与共同认知。即在一定技术效率下,社会对技术效率的认同度,科学技术水平与认识的有限性,科学技术的普及程度对执行效率的反馈作用。也就是说,执行效率的高低,一方面依赖决策主体与其他参与者的互动与协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执行过程中对政策的理解与认同,而认同又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因此,技术效率才是水资源配置的核心。科技认知作为一个长时段变量,一旦产生偏移,不仅会对分水系统本身的技术有效性产生根本影响,也会通过经济手段之外的途径改变各用水方所面临的执行成本,造成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稀缺。

然而,现有研究有意无意地都是在固化技术效率,即分水方案科学性前提下进行的,或默认技术效率最大化,争水系个体利益最大化导致帕累托无效率;或以技术效率低下作为争水出现的诱因,对水案发生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做出解释;或抛开技术效率,在习俗、人文环境的层面讨论影响水资源配置制度变迁的诸因素。因此,对水利组织、制度以及文化对政策效率的映射被局限在执行侧,缺失了对决策效率和技术效率的讨论,难以从政策的公平性维度出发展开评价,无从还原客观清晰的资源配置模式与效率。分水方案技术效率与利益相关各方认同、分水方案决策效率(制定分水方案用时)与执行效率(利益各方认可度)间是否存在正向或反向相关关系?这种关系又是否与政策重复博弈均衡的达成间存在某种联系?因此,借助现在科学方法判断清代分水方案是否符合科学,是争水与水资源配置方案之间关系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代区域水资源配置研究进一步深化的视野空间。

结 语

从经济的长期发展来看,作为生产要素的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有直接影响,一是要素组合对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提升,即资源配置秩序是否合理,二是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即资源配置模式及其效率。当前对清代山西水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尽管呈现出研究对象多元化与研究视角多样化的特点,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探讨也并未脱离这两个问题。另外,尽管每一种观点都能在不同区域或研究中得到证明,却依然缺乏一种具备普适性解释力的理论体系,即便是学界普遍公认的“水利社会”理论,也难以以为水资源的配置效率给出明确判断^③。中国古代究竟是如何看待水资源配置效率的?这是解决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研究的关键一环。

作为生产要素的水资源配置,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经济主体逐利动机的行为表现,即在一定的技术水

① [德]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5页。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页。

③ 张俊峰:《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空间、类型与趋势》,《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4期。

平条件下,为获取经济收益而投入资源。其配置效率则是各经济主体对利益诉求达成度的综合反映,简单来讲,政府的立法目的是财政收入或社会稳定的实现,民间则是经济用水需求的满足。清代是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高峰,生产要素,特别是水资源配置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受到清廷重视。然而,清代却并未在国家层面明确水资源配置的主体责任,无论是水权分配,还是水案审理,都由地方官府完成。这种模式并非没有优势,中国地域面积广阔,自然条件各有不同,地方官员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做出水资源配置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上传下达所需的行政成本和时间成本,提高决策和执行效率。但从长期看,这种模式存在两方面缺陷,首先,对地方官员的行政素质和科学素质要求较高,官员既需要愿意处理水资源配置事宜,又要有能力较为科学公正地解决问题,这对于以科考等途径入仕的他们来说并非易事。其次,地方官员的个体行为很难形成有效的制度,一任官员一种做法,反而会拉低政策效率,宏观上导致社会运行成本增加。在国家对水资源产权不明晰的前提下,地方官员的科学素质便显得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与官府态度、民众配合度都是评价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内容,而第一点正是现有研究未能涉及的。分析清代公共资源配置的技术效率,探讨决策、技术与执行三种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也许会成为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新视野。

(责任编辑:胡文亮)

(上接第 60 页)

续表 5

| 历法名称 | 行用时期 | 与二十四气有关记载 |
|------|--|---|
| 崇天历 | (北宋)公元 1024—1065 年 公元 1068—1075 年 | 日躔表 |
| 纪元历 | (北宋、南宋)公元 1106—1135 年 | 日躔表 |
| 统元历 | 公元 1136—1167 年 | 日躔表 |
| 乾道历 | 公元 1168—1176 年 | |
| 淳熙历 | 公元 1177—1190 年 | |
| 会元历 | 公元 1191—1198 年 | |
| 统天历 | 公元 1199—1207 年 | 日躔表 |
| 开禧历 | 公元 1208—1251 年 | |
| 成天历 | 公元 1271—1276 年 | |
| 知微历 | (金)公元 1181—1234 年 (元)公元 1206—1280 年 | 二十四气卦候表;二十四气日积度及盈缩表;二十四气中积及朏朒表; 太阳黄道十二次入宫宿度表;二十四气升降及日出分表 |
| 庚午元历 | 未行用 | 二十四气卦候表;二十四气日积度盈缩表;二十四气中积及朏朒表; 二十四气升降及日出分表 |
| 授时历 | (元、明)公元 1281—1644 年 | 气候表 |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华书局编《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1976 年)中,对现存所有历法中与二十四气相关文献汇总整理,制作而成。